



大学经典

〔南朝梁〕刘勰 编

# 文心雕龙

黄霖 导读  
黄霖 整理集评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 文心雕龙

[南朝梁] 刘勰 著

黄霖 导读 黄霖 整理集评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心雕龙/(南朝梁)刘勰著;黄霖导读;黄霖整理集评.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2 (2010.8重印)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大学经典)

ISBN 978-7-5325-4948-1

I. 文... II. ①刘...②黄...③黄... III. 文心雕龙—  
文学研究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40913 号

---

责任编辑 杜东嫣

装帧设计 陆智昌

---

## 文心雕龙

[南朝梁]刘勰 著 黄霖 导读 黄霖 整理集评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20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www.ewen.cc)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mm 1/16

印 张 13

插 页 4

字 数 230 000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978-7-5325-4948-1/1·2015

定 价 22.00 元

##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委会

主任

陈 昕

委员

丁荣生	王一方	王为松	毛文涛	王兴康	包南麟
叶 路	何元龙	张文杰	张英光	张晓敏	张跃进
李伟国	李远涛	李梦生	陈 和	陈 昕	郁椿德
金良年	施宏俊	胡大卫	赵月瑟	赵昌平	翁经义
郭志坤	曹维劲	渠敬东	韩卫东	彭卫国	潘 涛

## 出版说明

自中西文明发生碰撞以来，百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即无可避免地担负起双重使命。梳理和探究西方文明的根源及脉络，已成为我们理解并提升自身要义的借镜，整理和传承中国文明的传统，更是我们实现并弘扬自身价值的根本。此二者的交汇，乃是塑造现代中国之精神品格的必由进路。世纪出版集团倾力编辑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之宗旨亦在于此。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包含“世纪文库”、“世纪前沿”、“袖珍经典”、“大学经典”及“开放人文”五个界面，各成系列，相得益彰。

“厘清西方思想脉络，更新中国学术传统”，为“世纪文库”之编辑指针。文库分为中西两大书系。中学书系由清末民初开始，全面整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术著作，以期为今人反思现代中国的社会和精神处境铺建思考的进阶；西学书系旨在从西方文明的整体进程出发，系统译介自古希腊罗马以降的经典文献，借此展现西方思想传统的生发流变过程，从而为我们返回现代中国之核心问题奠定坚实的文本基础。与之呼应，“世纪前沿”着重关注二战以来全球范围内学术思想的重要论题与最新进展，展示各学科领域的新近成果和当代文化思潮演化的各种向度。“袖珍经典”则以相对简约的形式，收录名家大师们在体

裁和风格上独具特色的经典作品，阐幽发微，意趣兼得。

遵循现代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的理念，秉承“通达民情，化育人心”的中国传统教育精神，“大学经典”依据中西文明传统的知识谱系及其价值内涵，将人类历史上具有人文内涵的经典作品编辑成为大学教育的基础读本，应时代所需，顺时势所趋，为塑造现代中国人的人文素养、公民意识和国家精神倾力尽心。

“开放人文”旨在提供全景式的人文阅读平台，从文学、历史、艺术、科学等多个面向调动读者的阅读愉悦，寓学于乐，寓教于心，为广大读者陶冶心性，培植情操。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温古知今，止于至善，是人类得以理解生命价值的人文情怀，亦是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精神契机。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先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由此，我们深知现代中国出版人的职责所在，以我之不懈努力，做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7年1月

# 导读

黄霖

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文论史上的一部经典。其体系之完整、识见之精深、影响之久远，罕有其匹。鲁迅曾站在世界诗学的高度上将它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相提并论：“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西则有亚里士多德之《诗学》，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模。”<sup>[1]</sup>事实确是如此，这部成书于一千五百年前的“艺苑之秘宝”（黄叔琳《文心雕龙序》），不但是属于中国的，同时也是属于世界的。

## 一、关于刘勰

刘勰，字彦和，《梁书·刘勰传》说他是“东莞莒（今山东莒县）人”。其实，这是说他的祖籍。早在西晋永嘉之乱时，北方士人纷纷南迁，刘勰的先辈也逃到了南方。他的祖父刘灵真、父亲刘尚，及他都生长在京口（今江苏镇江）。京口是当时的重镇，经济发达，人文荟萃，许多有名的学者先后在这里讲过学，文化气息浓厚，这可能对刘勰的成长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刘氏传为汉朝王室之后，刘灵真是显赫一时、官至司空的刘秀之的弟弟，但他似乎没有当上官。刘勰的父亲刘尚曾任越骑校尉，这是掌管越人来降后编为骑兵的官，俸禄约二千石。因

此尽管刘勰早年丧父，家道中落，但还是有足够的经济实力保证他年少时的“笃志好学”，阅读了大量的儒家经典与其他著作，奠定了他的学术思想的根基。《梁书·刘勰传》说他“家贫”，只是相对过去而言。至于他一生“不婚娶”，原因也比较复杂，可能主要是出于信佛而不是“家贫”的缘故。

刘勰的生卒年，也无确切的记载。经推算，约生于刘宋泰始(465—471)初年，卒于梁武帝普通二年(521)前后，享年约五十六七岁<sup>[2]</sup>，历经了刘宋、齐、梁三朝。他生活的这个时代，秦汉以来的专制独裁统治正在被削弱，儒家学说独尊的局面也受到了玄学、佛教的严重挑战，这都为思想的解放、个人意识的觉醒，以及文学创作的繁荣与文学批评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当时，文学事业已对人们有巨大的吸引力，作家的队伍迅速扩大；文学的门类越来越丰富；作品的内容有了较大的开拓；表现的手段也有了多方面的提高；对于文学的审美特点的认识也日趋清晰。从文论的角度来看，稍前于刘勰的魏晋时代的曹丕所写的《典论·论文》，提出了“文以气为主”，“诗赋欲丽”。陆机的《文赋》更是自觉地总结文学创作的心理与甘苦。还有如晋代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李充的《翰林论》等将文章分体编纂，并对各体文章的源流、特点、代表性作家作品加以论述，标志着文体意识的逐步明确。文与学、文与笔，正在被逐步区分开来。文学正在走向一个自觉的时代。这样的一个时代，就呼唤着一个伟大的文学理论家的到来。

然而，南朝时期，佛教盛行。士子在习研儒家经典的同时，也好趋风学佛。齐武帝永明年间(483—493)，当时著名的高僧僧祐奉皇帝之命到江南讲学。大概就在这时候，二十五岁左右的刘勰跟从僧祐，在南京定林寺校经、读书、编书十年，但并未落发出家。僧祐(444—518)，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人，在当时“德炽释门，名盖净众”(《会稽掇英总集》卷十六《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像碑》)，著有《释迦谱》五卷、《世界记》五卷、



《出三藏记集》十五卷、《萨婆多部相承传》五卷、《法苑传》十卷、《弘明集》十四卷等。定林寺建在蒋山之上，四周林木葱茏，规模宏伟，香火极盛，名闻遐迩。寺中藏有丰富的典籍。《梁书·刘勰传》云：“(刘勰)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存之。今定林寺经藏，勰所定也。”在这十余年中，刘勰除了刻苦钻研释典之外，也广泛阅读经史子集。这不但使他“博通经论”，而且也使他“深得文理”，提高了思维能力，得到了学术训练。在这里，佛学的因明逻辑、辨析思维等无疑对刘勰完成《文心雕龙》有一定的影响，但并未动摇他的儒学根基。他在定林寺中，尽管也写了如《灭惑论》等坚决维护佛法的文章，但他还是在等待时机，以求一展其抱负，所谓“君子藏器，待时而动。……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文心雕龙·程器》)。

当他三十岁以后，深感到岁月飘忽，出仕无望，“身与时舛，志共道申”(《文心雕龙·诸子》)，面对着社会上“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文心雕龙·序志》)的文坛大势，就决心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撰写《文心雕龙》，以针砭时风，“树德建言”，“标心于万古之上，而送怀于千载之下”(《文心雕龙·诸子》)。

关于《文心雕龙》的具体成书时间，清人刘毓崧在《书〈文心雕龙〉后》(《通义堂文集》卷十四)中曾有考证，认为当在齐明帝永泰元年(498)至齐和帝中兴二年(502)之间。一般认为这个推断是可靠的。至于如《隋书·经籍志》等史志、《直斋书录解題》等目录和明清各种版本的《文心雕龙》多署为“梁刘勰撰”，是因为按史家之惯例，以作者所终之时代题署，刘勰于梁代去世，故题作“梁刘勰撰”了。

《文心雕龙》成书后不久，雍州(治所在今湖北襄阳)刺史萧

衍起兵杀死齐和帝，在建康称帝，建立梁朝，时在公元502年春夏之交。当时的刘勰十分担心自己这个无名小辈所作的《文心雕龙》湮没于世，常处于“茫茫往代，既沉予闻；眇眇来世，倘尘彼观”（《文心雕龙·序志》）的焦虑之中。为了得到社会的承认，他不得不想方设法去寻求权威的肯定。当时的沈约，是一位地位贵显的文坛领袖，又与僧祐有一定关系，且喜奖掖后进，所以，刘勰有一天就背着自己的这部著作，扮作卖货郎的样子，等得沈约的车驾到来时，趋前求见。沈约接入手稿，回去阅读之后，大为赞赏，认为它“深得文理”，常放在案头翻阅。刘勰从而出了名。

或许是由于沈约的推荐，刘勰于天监元年(502)任奉朝请，从此走上了仕途。奉朝请，只是“奉朝会请召而已”（《宋书·百官志下》），实是个闲职。天监三年(504)，他兼任中将军、临川静惠王萧宏的记室。萧宏是萧衍的弟弟，对僧祐甚敬重，“崇其戒范，尽师资之敬”（《高僧传·僧祐传》），因此可能对刘勰有所了解而引为记室。记室是做秘书、书记一类的工作，颇为清要，时人认为“非文行秀敏，莫或居之”（《宋书·孔凯传》）。天监八年(509)，迁任车骑仓曹参军，掌管车骑将军王茂的仓库。在天监七、八年间，他还参与庄严寺和尚僧旻主编的《众经要抄》的编纂工作。大约天监九年(510)，出任太末(今浙江省衢县)县令。当时大县置县令，小县置县长，太末当是个大县。《梁书·刘勰传》说他“政有清绩”，看来他还是有治政才干的。

天监十一年(512)，刘勰出任萧衍第四子、仁威将军、南康简王萧绩的记室，同时兼任昭明太子萧统的通事舍人，掌管文书的进呈工作。梁朝十分重视东官的通事舍人，常选择一些出身名门而有才能、名望的人担任。天监十七年(518)，刘勰上表建议祭天地、社稷应与祭祀皇帝祖庙一样，不用牺牲，只用蔬果，被梁武帝采纳，迁任步兵校尉，掌管皇家林园上林苑的警卫军。

步兵校尉一职，多为名流所任，是一种荣耀的待遇。与此同时，他仍兼任东宫通事舍人。

刘勰兼任东宫通事舍人达六七年之久，自然与昭明太子萧统接触较多。萧统(501—531)，字德施，是萧衍的长子，谥号昭明。他礼贤下士，爱好文学。《梁书·昭明太子传》说他“引纳才学之士，赏爱无倦。恒自讨论篇籍，或与学士商榷古今，闲则继以文章著述，率以为常。于时东宫有书几三万卷，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他曾主编了我国现存最早的各体文章总集《昭明文选》，是中国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著作。此书的文体分类，显然受到了刘勰的影响。萧统又是个佛教徒，“崇信三宝，遍览众经，乃于宫内别立慧义殿，专为法集之所。招引名僧，谈论不绝”（《梁书·昭明太子传》）。因此，不难理解他与刘勰之间多有共同的语言，对刘勰“深爱接之”（《梁书·刘勰传》）。

天监十七年(518)五月二十六日，僧祐圆寂，年七十四，刘勰写了碑文。大概此后不久，萧衍命他与和尚慧震一起在定林寺重新修纂佛经。工作完成后，刘勰便上表请求出家，并自烧鬓发，以示决心。当得到萧衍的批准之后，他便于定林寺中变服为僧，改名慧地。出家不到一年，时约在梁武帝普通二年(521)，便溘然长逝，享年约五十六七岁。

据《梁书·刘勰传》所载，“勰为文长于佛理，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勰制文”。然今存碑志唯有《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像碑》一篇，载于宋孔延之《会稽掇英总集》卷十六。此文作于梁天监十五年(516)至十六年(517)间。这座石像是僧祐奉萧衍之命雕凿的，至今还可在浙江新昌县城西南石城山的大佛寺内见到。其他碑志如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十二《法集杂记目录》所著录的《钟山定林上寺碑铭》、《建初寺初创碑铭》、《僧柔法师碑铭》(又见于《高僧传》)，及《高僧传》提到的释僧柔(卷八)、释僧祐(卷十一)、释超辩(卷十二)三碑，皆不可

得见，仅存其目。另外，《弘明集》卷八中有刘勰的《灭惑论》一篇，此文作于齐代，是一篇佛学论文。刘勰的文章散佚虽多，但值得庆幸的是，《文心雕龙》还是比较完整地保存了下来，为中国的古代文论宝库留下了一颗最为灿烂的明珠，与天地长存。

## 二、关于《文心雕龙》

《文心雕龙》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主旨是什么？有没有体系？有体系的话，是什么样的结构？关于这些问题，众说纷纭。

从作品性质方面来讲，一些学者认为《文心雕龙》是一部写作学，或者是文章学性质的书<sup>[1]</sup>；另一些则认为它是文学理论，乃至是文学史、文学批评，或者是美学理论方面的著作<sup>[4]</sup>。

这种分歧之所以产生，主要是与一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对于“文学”的认识的变迁有关。20世纪初，在西方文论与美学的影响下，随着“纯文学”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美学”等学科应运而生。假如站在这些新的学科的基点上来反视中国古代，当然找不出“纯粹”的符合西方话语的理论著作。《文心雕龙》将史传、诸子、论说，乃至祝盟、铭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等等都视为“文”来加以论列，这些对象尽管不完全是“纯文学”，但多少也包含着一定的文学性，更何况刘勰所论毕竟也包含着诗、骚、赋等部分“纯文学”，所以，全书所论种种也多与西方框架中的“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与“美学”等有相通或相同的地方。因此，将它作为一部“文学理论”或“美学理论”来读也未尝不可。在中国文学观念进行“现代化”实乃西方化的一段时间里，就是以“纯文学观”来阐释《文心雕龙》，将它“提纯”的。但是，现在回过头

来用传统的、民族的文学观念来审视它的时候，就发觉《文心雕龙》所论的“文”并不是“纯文学”，而是“杂文学”或者是“大文学”，于是就自然地觉得，说《文心雕龙》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的、乃至是“美学”的理论著作是不甚妥当的了。在上世纪50年代，范文澜先生就指出“《文心雕龙》的根本宗旨，在于讲明作文的法则”<sup>[5]</sup>，可惜他没有展开。后经王运熙先生等阐发<sup>[6]</sup>，“应当说它是一部写作指导或文章作法”的认识深入人心。时至今日，认为《文心雕龙》是一部文论或美学著作的人，恐怕不会也不可能否定《文心雕龙》论的是“杂文学”，从而完全否定它是一部“写作学”或“文章学”的看法，但这并不能使人们就此放弃专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或美学的角度上来研究《文心雕龙》，因为这部书确实包含着丰富而精深的文学理论。反过来，认为这部著作的“宗旨是指导写作，是一部文章作法”的学者，如王运熙先生也认识到它“由于广泛评论了作家作品，系统研讨了不少文学理论问题，总结其经验以指导写作，因此具有很强的理论性，成为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中的空前巨著”<sup>[7]</sup>。王先生曾花了很大的精力，用十万字的篇幅将《文心雕龙》写进了《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因此，尽管目前就《文心雕龙》的性质有倾向于“写作学”与倾向于“文学理论”这两种不同的认识，但由于刘勰所论的“文”本身包含着现代通常所认识的“纯文学”，这就决定了他在总结当时“杂文学”写作法的同时，也包含了从现代意义上理解的“文学”理论。所以，从本质上说，两种提法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通融的。假如从刘勰的原意和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文心雕龙》是一部写作学；但假如从当前旨在借鉴和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或美学理论的立足点出发，也不妨将它看作是中国古代一部最伟大的文学理论专著。

既然关于《文心雕龙》的性质的两种认识有相通之处，那么在明确了之所以产生这种分歧的原由及其关键之后，似乎没有必

要再停留在此争论不休。重要的是，不论刘勰论的是“杂文学”还是论“纯文学”，总结的是“作法”还是“理论”，我们当首先努力弄清它的理论核心是什么。只有抓准了它的理论核心，才能纲举目张，顺藤摸瓜，正确地认识它的整个体系和学术价值。

要抓准《文心雕龙》的理论核心，其实并不困难，它的书名就为我们提供了一把最好的钥匙。可惜的是，千百年来，对于《文心雕龙》其书名，囫囵吞枣，不求甚解者多；认真思考，心领神会者少。近二十多年来，一些学者关注了《文心雕龙》的书名，但往往给人以“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之叹；一些学者已经抓到了痒处，又不能进一步生发。而这个问题，恰恰是研究《文心雕龙》基础的基础，因此有必要对它的书名作一番诠释。

其实，关于《文心雕龙》的书名，刘勰自己在《序志》的开头就将“文心”与“雕龙”分别作了说明：

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孙《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古来文章，以雕辵成体，岂取驺爽之群言“雕龙”也？

“用心”一词，可能借鉴于陆机《文赋》开头第一句：“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对于陆机的“用心”一词，李善注云：“用心，言士用心于文。”这就将“用心”解释为“专心”、“着力”的意思。这是第一种理解。后认为《文心雕龙》是“讲如何用心写文章”，就由此而来。有人将“文心雕龙”四字理解为“写文章的用心在于要把文章写得像精雕细刻的龙文一样美”<sup>[8]</sup>，实际上也是这样来理解“用心”的。至清代，顾施祯在《昭明文选六臣汇注疏解》一书中注释《文赋》“用心”两字时曰：“用心，作者之意。”这是第二种理解，即将“用心”解释为“用意”，恐怕与原意相距更远。后人将“文

心”理解成“文学思想”、“文学的心”、“文学创作的原理”<sup>[9]</sup>、“文章的本质和精粹”<sup>[10]</sup>，恐怕都与此相近，不甚确切。其实，刘勰的“用心”不同于李善、顾施祯等理解的“用心”：“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这个“用心”，实为动宾结构短语，就是“使用其心”的意思。因《孟子·告子》说过“心之官则思”，因此今人常常推论古人心目中的心是一个思维器官。用心，就理解为是思维活动。其实，古人心目中的心，即同今人的脑，统管着人的包括感觉、知觉、记忆、思维、想象、情绪等一切心理活动。使用心，就是使整个心活动起来。作家写作的过程，就是各种心理活动的复杂过程。这样，“为文之用心”一句的意思，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作家写作时的整个心理活动，假如将它仅仅限定在“创作构思”方面，就未免显得太狭窄了<sup>[11]</sup>。作家临文写作时的心理活动，当然包括原则的遵循、方法的运用、态度的端正、灵感的触动、构思的经营、想象的驰骋、意象的形成、风貌的呈现、修辞的选择、技巧的借鉴，乃至关系到客观时势的盛衰、写作主体的修养、客观批评的标准等种种问题。可以说，作家为文时的“用心”将关系与规定写作的全过程，这包括临文时的心理活动，以及这种心理活动与主客观各种条件的关系。因此，“用心”两字，统领了全局，就是全书的理论核心。这就难怪乎刘勰感叹道：“心哉美矣，故用之焉。”

关于“雕龙”两字，刘勰在《序志》中解释说：“岂取骀夷之群言‘雕龙’也？”由于这里用了“岂取”两字，从而也引出了一些不同的理解。李庆甲先生曾在《〈文心雕龙〉书名发微》一文中概括有“否定”说、“无关”说、“肯定”说三种<sup>[12]</sup>。其实，这一句“与《文心·杂文》‘岂慕朱仲四寸之珪乎’句一样，都是用反诘语气表示肯定，句末‘也’字作疑问助词用”<sup>[13]</sup>。假如结合刘勰将“雕龙”用于自己的书名，在《时序》篇中又以褒扬的态度来提到骀夷，以及全文就是用漂亮的骈

文来写作的话，当为肯定“骏爽之群言‘雕龙’”无疑。他就是借用战国时骏爽之文善辩饰，似若“雕镂龙文”，人称“雕龙爽”来形容自己的著作<sup>[4]</sup>，也是“雕缚成体”。裴骃释“雕龙”为“雕镂龙文”，无非是形容其雕刻之精与图文之美。刘勰所说“雕缚成体”之“缚”，就是繁密、细致的意思。梁代江淹《别赋》有云：“赋有凌云之称，辩有雕龙之声。”又将雕龙与善辩联系在一起。所以，“雕龙”两字，含有精、美、密、辩等几层意思。刘勰即借以形容自己的著作是富有论辩的色彩，且写得十分精美、细密。

这样，将“文心”与“雕龙”合起来看，“文心”是中心词，“雕龙”是修饰语，用来形容如何论“为文之用心”的。个别学者将“雕龙”视为中心，于是将书名理解为“为文之用心”，在于“要把文章写得美”，显然，与全书实际的理论倾向首先强调原道、征圣、宗经等是不合的<sup>[5]</sup>。近有学者又将它们视为并列的结构，表明“他在撰述之时，是分别从构思与美文两方面着手而进行探讨的”，所证的例子是萧统《文选序》中说的“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卞兰《赞述太子赋并上赋表》中的“沉思泉涌，华藻云浮”、谢惠连《雪赋》中的“抽子秘思，骋子妍辞”等，认为“文心”与“雕龙”犹如“沉思”与“翰藻”、“沉思”与“华藻”、“秘思”与“妍辞”一样是相对的<sup>[6]</sup>。其实，“文心”与“雕龙”是不能与这些例子比对的。这些例子确是符合当时“骈体文的写作特点”，而“文心”与“雕龙”并不是“两两相对”的组合。况且，恕我孤陋寡闻，历来的文章题目，很难见两词骈对的。“文心”与“雕龙”是一主一副，合起来的意思，就是将“文心”像“雕龙”般地加以论述，或者说“雕龙”般地论述“文心”。这样，“文心雕龙”的意思就是：将写作的心理活动用精美的文辞予以细密地论述。据此书名，可知《文心雕龙》即是一部用美文来细致、系统地论述写作心理活动的著作。或者说，《文心雕龙》就是一部以写



作心理学为核心的美文体文章学。一个书名，就清楚地表达了全书的性质与宗旨。

围绕着“用心”即写作心理活动这个理论核心，《文心雕龙》用五十篇文章，加以系统地论述，结构严密。其最后一篇《序志》，相当于现代的“自序”，但循古代的通例，将它置于最后。其余四十九篇的安排，极具匠心，其概略即在《序志》中有所说明：

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若乃论文叙笔，则固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上篇以上，纲领明矣。至于剖情析采，笼圈条贯，摘《神》、《性》，图《风》、《势》，苞《会》、《通》，阅《声》、《字》，崇替于《时序》，褒贬于《才略》，怛悵于《知音》，耿介于《程器》，长怀《序志》，以驭群篇：下篇以下，毛目显矣。位理定名，彰乎大衍之数，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

这里，他将前二十五篇称为“上篇”，后二十四篇称为“下篇”。

“上篇”中的头五篇为“文之枢纽”，也就是作文的根本关键，是开展心理活动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这五篇中又分了两组：《原道》、《征圣》、《宗经》为一组，《正纬》、《辨骚》为另一组，从正与奇两个不同的角度来加以说明。前三篇中以《原道》篇为纲。《原道》篇实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论文章产生的“自然之道”；第二部分论儒家经典所文之道。这篇的第一段实为全书的纲中之纲，即开宗明义地点明了文章之产生，是天、地、人“三才”之中独具“性灵”的人的心理活动的自然结果：秉有智慧的人类生活在天地之间，“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